

中国散文诗论稿

李纯人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书 名：中国散文诗论稿

作 者：李纯人 著

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ISBN：7-207-03354-0

中图法分类号：I0

出版日期：1995

定价：11.50

总序：金秋有景胜于春 ——总序《五花山文学丛书》

冯建福

这9位作家最大的心愿莫过于以出版自己的著作庆祝共和国50周年华诞。

现在他们如愿以偿了。

这套9部作品集被称为《五花山文学丛书》，与读者见面。

—

说来也巧，我写这些文字时正值金秋，又是“五花山”将要出现的时候。

这让我想起26年前的一段往事：

那年秋天，我作为一名下乡知青，随所在团（现在叫农场）打鱼队去乌苏里江打鲑鱼（俗称“大马哈”）那个叫“小黑鱼泡”的渔点在抚远县境内。我记得那地方临山面水，中间是一片荒草甸子。因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见散放的牛群，不见人影，显得野性十足。好在那些与我同去的打鱼人有常年江上作业和野外生活的习惯，并不在乎这些。一到地方他们就忙着打草盖房，埋锅造饭，使荒凉的草甸子上很快有了生气，随后是四十多天漫长的打鱼生活。那一次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件是在鱼汛高潮，即“大

喷儿”上鱼时,打鱼人为多下一趟网,多起一网鱼,你争我抢,不舍昼夜的那股劲头儿。打鱼人戏称为“鱼红眼儿”。第二件就是我在那儿看到了秋天的奇景——“五花山”。

秋分过后,天气转凉。虽然晴朗的白天,仍然是艳阳高照,风和气爽,但夜里已经下霜了。天气的变化,使山上的各种植物停止生长,而把夏日里积聚的能量和营养转而用于育化果实。看上去植物的叶子很是繁茂,枝条也更加硬朗,但标志青春的特征已经不在。绿色王国中成片的绿色大面积褪去,有的变浅、变淡,有的发红、发黄……,所剩绿色愈发浓重和沉郁。更有挂满枝头的果实,近看星星点点镶珠嵌宝,或层堆块累,含金吐玉;远看则五色生辉,莽莽大山换上了一袭华美的盛装。在夺目的色彩中,有红色如腾飞的火焰,有黄色似抛洒的黄金,有蓝色像堆砌的宝石,有白色酷飘动的云朵,还有绿色宛若历经沧桑的老玉。尽管长空依旧澄澈瓦蓝,大江依旧奔流不息,草原依旧辽阔丰腴,但因“五花山”突兀而出,它们都不可思议地成了陪衬。那是何等的神奇!就像有造物主在其间施展无边的法力,用一双万能之手在人间幻化出偌大一个壮丽恢宏的场景,让人观之击掌叫绝。

这就是我看到的“五花山”。一个集美丽、丰厚、成熟于一身的形象,至今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过去二十多年了。这次重提“五花山”,并作为丛书的名字,我想自然是用其象征的意义。

一就作者而言,这9位作家无一例外的都是长者(均已年逾花甲,高龄者已近八旬)。如果人生可分“四季”当属人生的“秋天”。不过他们的“秋天”不在一个“老”字,而是以丰富的阅历和令人钦羡的学识和修养与“五花山”媲美。

二以作品而论,洋洋200万言,凡数百篇,选自作家各个时期或一段时间内的作品。有小说、散文、诗歌、文学理论和文艺评论文章等,可谓内容丰富、体裁多样。而其文笔、分量恰如“五花山”

的色彩和蕴藏。

三是“五花山”自身的地理规定性，它只适用于区域内作家作品，可谓地方特色浓郁。

勿需赘言，这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好名字。

二

许是出于工作原因，我常作关于我省文学的分期思考。以为从3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的六十年，黑龙江文学经历了现代文学奠基期；当代文学开创期；新时期文学形成期。与三个时期相对应，我省作家也有早期、中期和近期之分。本书作者多是5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60年代知名于文坛，他们应属第二代人。这一代作家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分析他们的情况，可以从中看出第二代作家的一些特点。

第一，他们是伴随着新中国脚步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他们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在新中国建立时步入文坛，而后成为作家。这样的经历使他们与生活有先天的亲和力。加之两个社会两重天，给了他们截然不同的际遇和天壤之别的体验，促使他们带着疑问走向生活，也带着最初的冲动去探索人生。他们最终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才找到了人生的真谛。于是他们担负起以文学反映生活，服务社会的历史责任。素有“煤矿诗人”之称的赤叶。早在50年代就出版诗集《初歌集》。他的诗以对矿山和矿工的挚爱真情，从今昔对比的角度，去反映矿山生产建设和广大矿工的新生。热情讴歌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讴歌了工人阶级意气风发、忘我劳动的豪情。读他的诗就像听到催人奋进的鼓声，给人以振奋的鼓舞力量。总览其他几位作家早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吕中山的短篇小说《现代纺织工》、《出徒》；钟涛的长篇小说《大甸风云》；中流的诗集《松花江短笛》；门瑞瑜的散文集《漠河白

夜》；刘畅园的长诗《雁来红的故事》等，也有同样感觉。这些作品无不以饱蘸激情的笔触，传达来自工农业以及各条战线生产建设和发展变化的信息，表现出广大人民群众的新精神风貌。并通过这些事件的描述和先进人物的塑造歌颂党的领导，歌颂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作品的基调健康、昂扬、向上。

第二，他们是深入思考和反思的一代作家。他们经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两个时期。在建国后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和 50 年代文化界的批判运动中，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冲击，甚至成为被打击对象。直到党的正确路线使他们再次获得解放和新生。这样的经历不仅丰富了他们的阅历，也培养了他们善于思索的个性，并给了他们洞察透视人生的敏锐力。他们之中的年长者蔡田、梁南，参加革命工作比较早，50 年代在北京就被卷入到运动中。蔡田参与了那场文化界的批判运动，并因发表长文《现实主义，还是公式主义》受到长时间的批判。他沉下心来，坚持真理，顶住压力。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还事物本来面目，终于讨回公道。那场运动和蔡田的文章都被记录在近期出版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谢冕主编）中。蔡田因之受到激励，以更加成熟的认识和热情投入对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的建树中。

梁南在 50 年代就以长诗《危地马拉兄弟，我望见你》和《最近北非利加州发生了什么事情》知名于诗坛。后因被错划为“右派”，二十多年一直遭受不公正的对待。也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以平反复出。他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感激之情，以更为深刻的思考和更臻完美的表现，创作出版了多部诗集。他著名的“归来诗”，首首都是“苦吟”之作，其中既有血和泪的凝结、游子断肠的悲哀，也有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的苦恋。读他的诗可以从中看到他对历史的反思，对真理的探索和对未来的希冀。

毕方、钟涛 70 年代曾发表长篇小说《千重浪》，80 年代又合写

了中篇小说《光明屯记事》。两篇作品从取材和表现看可以说是姊妹篇。不同的是后者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为弥补前者的“局限”和“失误”，作者经多次重返当年生活过的农村调查采访，重新反思认识过去那段生活写成的。作者为能了此心愿“深感欣慰”。

第三，他们在创作上采用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对于本书作者来说，采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固然有年代外部原因，如与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渊源和50年代文坛盛行现实主义有关，但主要还在于作家的内在原因，如作家不同的经历、所受教育、认识论根源等。本书作者的特殊经历使他们特别看重事实，学习后又极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能动的反映论。这是决定文学表现的认识论根源。前文提到的吕中山反映工业生产和工人生活的短篇小说，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通过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历史的发展方向，这在运用现实主义手法方面是比较突出的。

三

从9位作家身上，还可以看到一个属于所有作家的共同点：那就是对生活、对文学的热爱。我们知道，一个人是不能没有生活的，因为生活是他生命的过程；而对一个作家，除了生活，还不能没有文学，因为那样就不成其为作家。中流说得好：“我宽慰，我热爱生活；我欣喜，我结识了诗歌。生活与诗歌，对我是一种永无休止的爱与美的诱惑。”他是用诗的语言，形象而深刻地表述了如上的道理。

然而这毕竟是理性的表白，只有当生活和文学真正成为作家人生的两个支点，并且互动起来的时候，作家的创作才是可能和现实的。

考察生活与文学的辩证关系，有两方面的基本内容。

首先,生活是文学的源泉。不是一般,而是惟一的源泉。别林斯基说:“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从而也有诗的内容。”为了文学,作家特别热爱生活,把已经熟悉的生活作为创作资源加以储备。就像钟涛、毕方之于北大荒生活;赤叶之于煤矿生活;吕中山之于纺织工人生活;梁南之于那些历经磨难、不堪回首的往事,每当用时甚至可以顺手拈来。当然他们更多的是探寻、亲近,发现新的生活,主动去做开源疏浚的工作,下一番“深入”的苦功夫。或者像钟涛、毕方那样对似乎已经熟悉,以后又发生变化的生活进行再调查、再体验,重新占有。或者干脆到未曾接触、不很熟悉的地方去开拓新的领域。如吕中山、门瑞瑜、中流等到抗洪抢险前线去做战地采访,拓宽视野,补充新生活,积累新素材。

其次,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文学反映生活是能动的,因而要求“高于”生活,反作用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要求,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在作家看来,关键是提高作品的质量。梁南要求自己:“宁让笔头暂时荒芜,也绝不制造滥竽充数的赝品。”他呕心沥血,苦吟苦读,经常为写好一首诗、改定一个字,百次吟哦,千次推敲,直到满意为止。为了“诗”的研究,他涉足现代诗坛未曾引入的重大课题,考经据典,旁征博引,数易其稿,写出颇有价值的论文。刘畅园作为女诗人,选择了一条适合于自己艺术个性的道路。她表现生活不取宏观角度,从小事件、小人物、小景致入手,用有限而精炼的生活化语言,使诗具有深层意蕴,诗的意象充满活力。达到以小见大、玩味无穷的效果。这种个性化的追求,诚如她在一首诗中所言:“我追逐自己/寻找自己/奔跑天涯海角/找到了自己。”

认可文学的职能和作用,是作家选择、执著于文学的驱动力,是他们从自发进入自觉的一次飞跃。只有当他们把文学的价值看作是自己的人生价值,对文学才更加一往情深。蔡田曾因文学罹

祸在身，一度处于逆境，但他对自己过去选择文学无怨无悔。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他一直坚持读书、写文章、做学问，至今笔耕不辍。虽然文学的道路并不平坦，每前进一步都需要勇气，他还是愿意为之毕其终生。门瑞瑜说：“我知道世上的成功就像一座山，通向它的道路从来都是陡峭而崎岖的。”尽管如此，他还是不畏险途，坚持为了文学的成功而努力攀登着。这就是我们的作家！

现在这套丛书出版了，这是作者们从精心培育的文学园地采撷的精美花束，是他们辛勤耕耘几十年的以心血孕育的果实，是他们捧向祖国和人民的拳拳爱心。我忝为作序，实在惶恐；为不负所托，勉强为之。借此机会让我向尊敬的作家们表示敬意，也向支持丛书出版的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领导刘东辉同志、靳国君同志、赵长青同志，文艺处诸同志，以及方方面面的朋友们深致谢忱。

1999年9月于哈尔滨

总序：秋日补白

冯建福

秋分已过，该是“五花山”时节。以“五花山”命名的文学丛书，后一批作品即将出版。翻阅书稿，重读六年前我为该书写的“总序”，感慨之余，忽觉“总序”有缺，怅然其不能照应全书。于是再写以下的话，作为“补白”：

一、他与“五花山”一起，鲜活在我的脑海里。“总序”所记去乌苏里江打鱼，那年我27岁，任所在团的作训参谋。过来人都知道，那时是多事之秋，而且“边境无小事，事事通中央”。孟兆琦副参谋长所以带我们参谋去，也是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这位教我初识“五花山”的人，其实是地方干部，兵团组建前任我省蜿蜒河渔场的场长。他当年五十多岁，个头不高，略显瘦削。凭多年亲临一线指挥捕捞生产的实战经验，他养成了遇事不慌、处置果决稳健的作风，性格却也有些固执。出发那天，就是他亲自示范把四十多只挂子船先是两两捆拢，然后又连接成长队。因为我是指挥部成员，行进间可以呆在拖轮上，前看茫茫大江，后看风筝般摇摆的船队，上看蓝天白云，下看滚滚秋水；并听老领导讲江上行船常遇风浪，船队出行切不可单船行动，只有把各船连结为一体，才安全又不至于掉队的道理，心中甚为惬意！

果然，“天有不测风云”，当天傍晚就起了风。老领导审时度

势,命令船队就近驶向勤得利农场附近山下。船刚靠岸,大家纷纷解开系船的绳索,自顾划开找避风的地方。那一夜,副参谋长就与我们一起睡在拖轮驾驶舱的地板上。睡前他把仅有的两床被褥扔给大家,然后一声不响地裹着身上的棉袄和衣而卧。我们也只好硬撑着静候江上袭来的秋寒。每当夜里我被冻醒,都看到老领导独自坐着吸烟,黑暗中有烟头的光亮一明一灭。

在叫做小黑鱼泡的滩头(即渔点),又是他亲自张罗砍树枝、打草,搭草棚。让我忍俊不禁的是他竟然让人搭建起一个竖在空中的厕所,并解释说这样解手时就没有蚊子叮咬了。依我看这哪里是什么厕所,倒像是草甸子上的一个望哨。他还不忘指点我,帮我忙忙活活地搭起一个“马架子”(即草棚),算作我们两人的栖身之所。不用说,我这“杰作”会让他吃些“苦头”。头几天,老领导还能沉得住气,忙里偷闲地戴着老花镜躲进蚊帐里看书,那情形就像和蔼可亲的老爷爷,可我知道他心里有多急!终于有一天来了鱼汛的消息。在江上值班的二十连老贾那条船网到了第一条鱼。他急匆匆地提来向老领导汇报。嘿,这条大马哈鱼有十六、七斤重,身体浑圆匀称。老领导一边端详,一边啧啧称赞。几天来他几乎阴云不散的脸忽地绽开了笑容。他自信地断言:今年的渔头不错!当一轮圆月挂在树梢,月光下,老领导乘着高兴给大家讲起了大马哈鱼的生活习性和国内人工放养实验。此时旷野中的乌苏里江畔祥和而又宁静!

以后在白天就很少能见到老领导的面了。他天天都去江边瞭巡或跟船下江。有时夜里刚睡下,他忽又起身披衣下床,嘴里还叨咕着什么往外走。那是一个雨夜,我怕他出事,就跟在他身后走出门去。他打着手电,径直奔向江边。沿江的林间小道很滑,还有积水,他不顾这些,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听到有划船声,就停下来打招呼,问谁的船,打了几条鱼等。一直走到下滩头才又转过头往回

走。

当时兵团实行工资制，够叫人羡慕的。可遇到外出生产，总不能按部就班。老领导提出了按船定额、超额奖励的办法，没想到竟会引起风波。有人嫌定额太高、奖励太少，聚众找老领导理论。有人联想伙食不好，老领导不准吃作为“任务”的马哈鱼、只能吃杂鱼和带来的土豆，说老领导“太抠”。一位副连长还脸红脖子粗地给老领导上纲上线，说老领导是“剥削”。这时的老领导不愠不火，但对不合理的要求，却也是“江北的胡子不开面”，表现得相当固执。

那时兵团有个说法，称现役军人干部为“黄棉袄”；称非现役军人干部为“黑棉袄”。老领导孟兆琦虽只是位“黑棉袄”干部，但他如此严以律己、低调做人，执行上级决定坚决，完成任务毫不含糊，说实话，确实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让我受益非浅。三十多年过去，我返城后一度与老领导失去联系，后来就听说他已经走了——不再徜徉水边，而是驾鹤西去。可是每当想起往事，他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出来，与乌苏里江和“五花山”一起鲜活在我的脑海里！

二、关于这一代作家。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出这套丛书时，鉴于人数较多，决定分两批出版。前一批9位，多是作家；后一批7位，有作家，又有评论家、编辑家。他们是这一代作家的中坚和骨干。

在“总序”中，我曾概括他们的一些特点：他们既经历了建国前后的新、旧两个社会，也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他们人生阅历丰富，对社会、对人生的真切体验和深刻认识程度，是后来的作家们难以企及的。他们写自己经历的生活，看似平常，没什么特殊；可他们同时写出了社会，反映出时代精神，这就不同寻常，有些特殊了。如老作家王忠瑜，他亲身参加了上个世纪50年代发生在邻国的抗美援朝战争，亲眼目睹了年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与

老牌美国空军战斗实况。他以小说为载体,记录并艺术化了这段史实,讴歌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高尚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一往无前、战之能胜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的《鹰击长空》等篇小说能够脍炙人口,流传历史,就是因为他写出了当时的社会大事,而且准确无误地反映出时代精神。这种反映又是遵循艺术规律,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绝没有人为地拔高。老作家屈兴岐和郭先红,尽管他们的写作风格有所不同,但在他们的作品中,同样是忠实叙写、直抒胸臆:郭先红早期创作的短篇小说《站起来的人们》,通过一位外国专家对中国制造的产品和机床由诘难、挑剔到称赞、信服的变化,反映出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工业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小说情节简单、篇幅短小、却小中见大地表现出时代性主题。作家屈兴岐的散文集《瞬间》,收入其中的反映故乡生活、林区工人生活和其他生活的散文 120 多篇,其中多是作者亲历过的人和事。在《我知道你为了谁》一篇中,作者选择自己生活中遇到听到的共产党员的故事进行讲琐,展现了共产党员平凡而崇高的形象,表达了自己对共产党的无限热爱。他的许多文章都是从容自然、娓娓道来、毫无做作。其实老作家们无一例外地在作品中高扬时代主旋律,这与他们对人民大众生活的熟稔,与他们的“工农”情绪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他们的出身、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的人生选择乃至审美理想和创作道路,而且矢志不渝、受用终身。如屈兴岐同志所说:“所写生活可能过去了几十年,但写作时始终站在今天的审美观、价值观角度,不敢忘却作家的责任”。

他们是我省文学从现代走向新时期承前启后的一代人,在他们的创作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贴近生活、反映时代精神的优良传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必将对我省文学健康发展产生恒久的影响。

三、同为文学支撑者。人是不能没有生活的,对他们来说,文

学就是他们的生活。后一批作者中的黄益庸、鲁秀珍、王敬文、李纯人,他们或是文学评论家、或是文学编辑家、或曾经做过文学组织工作,或兼而有之,分工虽有不同,却都是终生以文学为业,文学事业也需要他们来支撑。

黄益庸同志曾任我省文学刊物《北方文学》主编,本人又是著名文学评论家,他的《黄益庸诗文选》包括对我省新老作家创作的评论、文学研究论文、历年创作的诗歌和散文等,从中可以看出他思想的清晰和文学理论功底的深厚。其中他的理论文章《谈咏史诗的构思角度》等几篇,见解深刻、论述独到,更可看出他对诗歌研究的高深造诣。鲁秀珍,献身文学编辑事业四十年,用她的话说,此生是“从一而终”,她工作成绩突出,为许多作者所感念。她的《国门内外》完成于退休后,是写作的回顾、职业的回顾、也是人生的回顾,从容写来,亲切自然。特别是从《回忆的春天》到《假如北方没有雪》等篇,写出了她对编辑事业的钟爱与执着,真正是她编辑人生的写照。王敬文是小说评论家,也是小说创作者,他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研究探索,有了自己的建树。他的《小说创作论稿》,是他此前关于小说创作的三部理论专著的精选,并收入了他近年来对小说创作最新成果的论述。他的《艰难的起步》等篇,深入浅出,是帮助青年业余作者学习小说创作的力作。李纯人同志有丰富的散文诗创作经验,在此基础上进入对散文诗创作理论的研究,《中国散文诗论稿》就是他近些年倾力研究的结晶。这部书综观世界文坛散文诗的发展,论述了散文诗引进我国的过程、成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提出了散文诗分期问题。探讨了散文诗文体界定问题、载体论问题、以及散文诗美学特征、写作特点、语言特点等问题,既很系统,又不乏独到见解,填补了省内散文诗理论研究的空白。总之,他们是以自己的终生追求和奉献给文学的丰硕果实,昭示着对文学的热爱,文学亦应像感谢作家们那样感谢他们!

6 中国散文诗论稿

一部“五花山”文学丛书,是不必有两个序言的。将以上文字对照原“总序”,当然不是另起炉灶,只是按其框架进行了必要的内容补充。所以叫“补白”,是因为原来有“留白”。不补有缺,补来无憾矣!

2005 年秋于哈尔滨

书 前 语

这本书是我 20 世纪 70 年代接触散文诗后,从学习和创作散文诗过程中,所积累的对散文诗理论的认识,2003 年 1 月动笔一年后成稿,书中的观点,都是个人见解,谬误处难免,祈望有识之士指正。

散文诗理论的探讨,是中国散文诗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需要有更多的学者、散文诗作家来研究,在这方面,柯蓝和郭风两位老作家一直十分重视,下边摘录郭风的话,可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另有一篇是柯蓝的《关于散文诗理论》是我主持黎明散文诗函授中心时,为我编辑出版的《散文诗写作讲稿》一书写的序言,虽然已过二十年,但今天读起来,仍然对今天的散文诗理论研究有很好的指导作用。现也附录于后。

附:

郭风:散文诗理论和研究

……

第一,有关散文诗创作的理论研究以及对于散文诗发展情况(包括现代、当代)的估价等方面,在我们的有关评论文章中有若干不同见解,随便举例来说,譬如,我国散文诗渊源及其传统问题:散

文诗是否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文体问题；散文诗自身派生出来的诸多的文学样式问题；当代散文诗对于古典散文诗的传统继承和对于国外引进的散文诗的借鉴问题，以及关于三四十年代我国散文诗创作（在发展？还是低落甚至于空白状态）的质量问题，凡此等等，我认为读者以及散文诗作家和研究家，可以从本书中得到第一手认识的“资料”，从而在理论上提出个人的但是较为切实、中肯的见解，而非凭印象或感觉乃至从个人的臆测、情感出发作判断。

理论乃至哪怕一个人的见解，如果不从作品和创作发展情况出发，往往混淆视听，就散文诗来说，这不利于它的正常健康发展。

第二，……我个人有时认为，所谓文学史，从真正的意义看来，其实是历代诗人、作家的作品书写成的历史。从某种特定状况看来，我们说《古文观止》（随便举例），似乎更能真切地、明晰地看见自先秦以至明代的我国散文发展状况，以及某一阶段出现的散文作品之佼佼者；又如读《唐宋词举要》（也是随便举例），似乎可略见唐、宋之断代的诗歌发展状况，与其具体的历史，并且感到格外亲切。我相信，本书（《中外散文诗鉴赏大观》）的读者将能从中一定程度地看见当代的散文诗领域内出现的历史景象（姑不论外国的），并从而获取某种历史知识和教益。

不过，我可否提醒一下，即散文诗截止目前，它在众文体之中，或云与散文、小说、诗歌等相比，数量较少（古今中外皆然），但这不影响它在文学史中的独立地位。某一文件在文学史中的自在地位，取决于该文体是否出现杰出作家和作品，而不在于该文体是否出现众多的作品（如有众多和杰出作品，当然很好）。既然以上提出本书具有具体作品来体现历史的性质这一见解，顺便也提出这点看法，也许是必要的。

此外，我还想说，散文诗作为一种表现社会生活、自然景象和诗人思想感情的载体，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当然不可与另外一些